

銀慶文 去月廿四日
 十三日早 依 寄 友 送 字 底 件 有
 擬 條 底 一 紙
 十日 款 寄 前 來 稿 及 外 國 已 將 三 張
 稿 寄 單 交 去 共 九 十 餘 人 內 有
 松 鶴 數 命 廉 三 第 有 稿 近
 錫 之 子 有 胡 廉 訪 長 德 趙 皆
 革 職 為 有 數 遺 在 茲 抄 錄 左
 又 洋 界 地 段 事 已 派 瑞 良 息 珍
 暨 順 天 府 派 員 會 同 查 辦 奉 例 事
 現 既 到 國 稅 務 設 項 為 查 辦 法 也
 錫 壯 太 來 託 辦 匯 票 事 及 其 委
 存 款 七 百 之 奇
 十五日 依 百 免 陸 成 出 先 正 錄 換 下
 二 冊 書 收 八 百 字 末 三 處 述 亦 字
 淵 源 之 所 自 俾 我 輩 咸 知

辛丑日記 紹英撰

上 等 見 武 官 由 于 與 者 大 舉 見
 上 均 均 生 蘇 事 後 散 已 年 到 未 仍 往 前
 十 日 早 王 爺 到 改 在 軍 機 處 辦 事 用
 恭 祝 院 院 已 在 昨 日 赴 日 年 後 飯 居 偏 張 州 撤
 與 日 年 後 領 安 涉 中 令 令 予 回 京 一 看
 午 收 回 京
 十六日 早 進 內 王 爺 到 辦 事 與 中 華 國 完
 與 者 大 往 前
 十七日 早 王 爺 到 開 陽 師 傳 云 天 津
 然 而 故 老 方 然 尤 尚 可 懼 不 可 不 特 敬 慎
 危 懼 之 然 意 也 事 畢 王 爺 與 大 帥 等 均 數
 隨 同 世 中 老 者 矣 在 內 位 前 此 事 於 事
 前 雖 未 揚 揚 然 亦 未 行 昨 晚 更 刻 王 爺 與
 外 間 有 此 消息 令 張 文 治 給 予 送 行 予 印 志
 世 中 老 已 報 告 復 王 爺 府 獨 見 後 示
 後 進 內 值 前 同 世 中 老 者 矣 榜 候 是 夜
 亦 能 安 睡 戒 佛 守 衛 以 待 天 曙 接 洽 云
 十四日 早 王 爺 到 仍 在 為 者 辦 事

兢業齋日記 紹英撰

绍英日记

古籍馆 刘波

绍英（1861—1925），满洲镶黄旗人，马佳氏，字宾旭，又字越千。初以荫生任职工程处，庚子事变后，任职于步军统领衙门，办理警政。光绪二十八年（1902）任京师大学堂提调，次年授商部左参议，不久升任右丞。三十一年（1905）奉派出洋考察宪政，临行遇刺，未能成行。随后署理商部左臣，擢任户部右侍郎、度支部左侍郎。宣统三年（1911）七月，署度支部大臣。清帝退位后，在溥仪小朝廷中任总管内务府大臣。绍英政治态度平和，处事谨小慎微，为官清廉，而勤奋好学，毕生留下日记40册，现存33册。他的日记中，不仅记载了清末民初的众多历史事件，还详细载录了有关进奉赏项、祭祀礼仪、官场应酬、请托关说、家产处置、寻医问药、商号往来、股票交易等事项，内容丰富，涵盖面广，不失为中国近代史、近代社会史研究的珍贵史料。这些日记经整理后以《绍英日记》为名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于2009年影印出版。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馆藏珍贵历史文献展上也展出了几册不同时期的绍英日记。

一. 庚子避难日记

庚子事变前后任职于工程处与步军统领衙门的绍英（1861—1925），在其日记中，对八国联军进京及此后的和谈，也有简略的记载。

绍英《光绪庚子年避难日记》中，简要地记述了八国联军在北京的暴行。如：

（七月）廿三日。阖家在西北小院暂避，日本兵八名来搜，索银表等物而去。

满族亲贵绍英的家，在七月二十三日（8月17日）遭到日本军队的搜查与抢劫。其他民居市肆，所受惊扰、劫掠与破坏，可以推知。

绍英虽然并不负责外交事务，但对清廷与各国交涉的情形多有所闻，在其1901年的日记中有多处相关记载。比如：

（二月）十四日。敬斋翁来，谈及各国已将二次祸首单交出，共九十余人，内有松鹤龄、俞廉三、荣伯衡、延锡之，又有胡廉访、长继超，皆革职，尚有发遣者、交中国查看者。又洋界地段事已派瑞良、乌珍暨顺天府派员会同查办矣。……

所谓祸首，即主张招抚义和团的官员。据二月十四日（4月2日）日记，各国至少分两批提交官员名单，令清廷惩处。所谓“二次祸首单”，即指《驻京各国钦使续请惩办罪首照会》所附《查明

重罪应行严惩各员详单》，载于《西巡回銮始末记》。绍英所记的数人，均见于《详单》：

松鹤龄即松寿（？—1911），鹤龄为其字，满洲正白旗人。1898年擢任江西巡抚。义和团运动中，他抽调威武新军1600人，命副将王德怀统带入京。后官至闽浙总督，辛亥革命时自尽。《详单》这样指责松寿：“江西巡抚松寿，遵奉朝旨，引火燎原，所派委员以招兵为词，聚党焚掠教堂。罪应革职，永不叙用。”

俞廉三（1841—1912），字虞轩，浙江山阴人。1898年调任湖南布政使，戊戌政变后升任湖南巡抚。八国联军侵华时，派布政使锡良率兵北上勤王。又先后处理了衡州教案、辰州教案。《详单》指责：“湖南巡抚俞廉三，干涉戕害衡州府天主教教士二人之案。罪应革职，永不叙用。”

荣伯衡当指荣铨（生卒不详），义和团运动期间任浙江按察使。《那桐日记》宣统元年十月二十八日条有他们之间交往的记录。《详单》指责：“前按察使荣铨，通传杀害各国人民密谕，是以专责此肇乱之一端也。现在杭州仇视各国人民之党，伊为首领，其嫉视外人之行毫无隐讳。应革职，发往极边，永不释回。”

延锡之即延祉（？—1915后），锡之为其字，满洲镶蓝旗人，历任广东督粮道、河南按察使、山西布政使、西宁办事大臣、库伦办事大臣。《详单》指责：“山西布政使、前河南按察使延祉，以仇视各国人民之语通饬所属。罪应革职，永不叙用。”

胡廉访指胡景桂（生卒不详），字月舫，邯郸永年人。历任宁夏知府、山东按察使、陕西按察使。《详单》指责：“湖南按察使、前山东按察使胡景桂，于仇视各国人民之端，干涉其间，且引同官为党，并力庇拳匪，冀免杀教之咎。罪应革职，永不叙用。”

长继超即长萃（生卒不详），满洲人。义和团运动期间为仓场侍郎，主张利用义和团抗击列强。《详单》指责：“仓场侍郎长萃，在通州为拳匪头目。罪应革职，永不叙用。”

各国公使在清单中详细列出要求惩处的官员姓名、职务及原因，涉及的人物上至蒙古王公、驻藏大臣与各省巡抚、按察使等高官，下到县令、哨官及平民百姓，将近100人；且一一指明应如何如何惩罚，重则斩立决、斩监候、革职、永远监禁、发往极边，轻则申斥。列强的颐指气使、趾高气扬，清廷的软弱苟且、束手无策，于此均可见一斑，读之令人扼腕。

又如：

（二月）卅日。早，至廉惠卿处。……又见赫税务司筹还赔款之章程，大抵谓洋税均已抵偿洋债，惟地税、常税、漕折、盐务尚可筹款，但须分年归还。看其大略，甚有条理。

据这则写于二月三十日（4月18日）日记，可知庚子赔款的还款规划，实出自时任清政府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（Robert Hart，1835—1911）之手。

绍英日记关于庚子事变的记载，虽不够系统，不过作者身份特殊，所记皆为亲身经历，一鳞半爪，也不失为有价值的史料。

二. 出使日记

义和团运动后到辛亥革命的十年间，清政府为了化解严重的统治危机，以应对全国官绅民众日益增长的不满和抗争，推行了一系列“新政”。“新政”主要由洋务派官员推动并实施，具体内容包括：编练“新军”、废除科举、兴办学堂、奖励留学、改革官制、奖励实业、振兴商务等。这一系列措施对发展工商业、开启民智起了一定作用，延续了洋务运动的成果，推动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。

与此同时，民主思想也得到更广泛的传播，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君主专制政体的弊端，他们主张实行君主立宪，并取得了部分满汉官僚的支持。在民主革命思潮逐渐兴起的背景下，清廷为确保“皇位永固”（载泽《奏请宣布立宪密折》语），不得不接纳立宪派的要求，准备向君主立宪制过渡，实施“预备立宪”。

为借鉴欧美民主国家的政治经验，清廷于1905年派遣大臣出洋考察宪政。当年7月16日，清廷颁布谕旨，命镇国公载泽（1866—1928）、户部侍郎戴鸿慈（1853—1910）、兵部侍郎徐世昌（1855—1939）、湖南巡抚端方（1861—1911）出洋考察；不久，又添派商部右丞绍英出洋。五大臣拟分成两路：载泽、徐世昌、绍英赴英、法、日和比利时，戴鸿慈、端方赴美、德、意大利和奥地利。9月24日上午，五大臣率随员抵达北京正阳门车站，登上火车准备启程。不料革命党人吴樾（1878—1905，字梦霞、孟侠，安徽桐城人）乔装成皂隶，怀揣炸弹登上专车，意图炸死五大臣。当机车与车厢挂钩时，车身发生震动，触发了爆炸。吴樾当场死难，载泽、绍英受伤，出洋计划也随之搁浅。10月26日，清廷改派顺天府丞李盛铎（1858—1937）、山东布政使尚其亨（1859—1920）顶替徐世昌、绍英，仍分两路出洋。12月11日，五大臣从北京出发。至次年夏秋之交，除李盛铎留任驻比利时公使之外，四大臣先后回国。出洋考察宪政的五位大臣带回各种图书400余种，他们的考察报告后来辑成《列国政要》一百三十三卷、《欧美政治要义》十八卷。五大臣的宪政考察，是1906年9月清廷颁布“预备仿行宪政”谕旨的先声。

五大臣出洋与吴樾行刺事件是清末重要的政治事件，亲历此事的绍英，在日记中对事件经过有较详细的记载。

绍英日记的第十二册，为《出使日记》，记载1905年奉派出洋、遇刺辍行的经历。其六月二十五日（7月27日）日记记载：

六月二十五日。商部接到军机处交片，本日军机大臣面奉谕旨：着派商部右丞绍英随同出洋，考察各国政治，钦此。闻命之下，惶悚莫名。当赴承泽园见庆邸，庆邸云：泽公因未

曾出洋，请添派一人同往，因是军机处请旨派往，固有此交片也。即往见泽公，略谈日本立宪大意。……

所谓“庆邸”，即庆亲王奕劻（1838—1917），当时为领班军机大臣，并管理财政处、练兵处事务，执掌朝政大权。泽公，即载泽（1866—1928）。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，加派绍英出洋的原因，是因为载泽的要求。

七月份的多则日记，记载了启程前筹备出行、会见各国使节的经过，比如：

初四日。早至徐大人园，与泽公、戴侍郎、端午桥会商一切。徐大人留饭之后，同至承泽园，告明分班前往，予随同泽公、戴大人赴日本、美国、奥国、义国、俄国，并同拜各馆事。

初五日。拜义、英、俄、美四国公使。因胡侍郎请吃饭，未会。

初六日。拜奥、比、法、德、日本五国公使。比使未会。法穆使因往北戴河避暑，葛尔士接待。……

初七日。赴承泽园见庆邸，告以因应日本事各国周旋大意，请示奏事列衔否。王云：应同请训，应列衔，因同是钦派，前派四位已经明降谕旨，不便再明发，故由军机处交片也。令会同泽公、戴大人再拜美使晤谈为要。

初九日。至商部，发致美使函，订于十一日午后三点钟会晤。……

十一日。……午后，至泽公府，同拜美使晤谈。……

十五日。泽公来，同赴外务部，俄、法、奥、英、日本使臣来回拜。商定名片官衔拟用大清国钦差专使考察政治大臣兼本官衔。同徐鞠人见雷谱，同问国书及应否用敕书事，并要条约电本。定于廿日接晤德、美、义三国使臣。

廿日。赴外务部，接晤德、美、义、比四国使臣。

廿八日。庆邸请英、美、日本、德、法、义、比、奥、俄九国使臣公宴，并请出洋五人及外部堂官饮宴。时奏军乐侑食，当为欢畅。

八月十九日（9月17日）日记，记载了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召见出洋大臣一事：

八月十九日。随同请训，蒙恩召见。皇太后、皇上训勉周详，示以各国政治均应择要考察，如宪法一事现在虽不能宣露，亦应考察各国办法如何，以备采择。并蒙赏赐一路福星之吉语。……

八月二十六日（9月24日）至九月底的日记，则记载了登车遇刺及疗伤的经过：

廿六日。早赴前门东车站，会同泽公、徐大人登火车。甫登火车，忽闻炸炮一声，当时

跌倒。随有家人扶出，身受伤七八处，惟左股较重。即至法国医院调治，同去者为服部先生。医士欧宜穆、沙荷德调治甚效。暂在医院调理。

廿七日。会銜具奏车站匪徒施放炸弹事。蒙恩派太监玉家看视，并赏食物。天恩高厚，感激莫名。

九月初五日。由左股起出炸弹之钢子一枚。幸西医施治得法，虽疼痛，尚能忍耐。

九月廿六日。由医院归家。

绍英日记关于五大臣奉派出洋、车站遇刺等重要历史事件的记载，均出自事件当事人之手，使我们得以了解事件的某些细节。这些细节描述，甚至当事人的感想，详细具体，让我们看到生动鲜活的历史，实为难得的史料。

三. 张勋复辟日记

比如，关于张勋复辟，绍英在其《兢业斋日记》中，对事件的经过有详细记载。宣布复辟当天的日记载：

中华民国六年七月一号/宣统九年五月十三日。卯刻六点，张少轩大帅率文武员弁进内，呈递请复辟奏折，并飭随员代拟上谕等件。见《内阁官报》。

上召见张帅及文武随员毕，醇王爷亦到，遂阅所拟上谕。旋见张帅接洽一切，商定派张帅为议政大臣。办妥后上赏饭吃，在尚书房早餐。忆自三年十二月廿五日辞位，六载于兹，一朝光复旧业，固为可喜。然而后患方殷，尤为可惧，不可不持敬慎危惧之态度也。……

透过日记，清朝遗老对于复辟的欣喜之情，由此可见一斑。绍英毕竟阅历丰富，深知复辟并非易事，因此告诫自己“不可不持敬慎危惧之态度”。此后几天，绍英所记较为简单，似乎没有大事发生。从这里也可以看出，皇室在社会上实已不能有所作为，复辟大事只任凭张勋张罗。

段祺瑞“讨逆军”誓师北上，张勋所统辫子军毫无招架之功；而逊清皇室对时局则始终没有清晰的判断，稍有异常就仓皇失措。绍英日记中记载：

十九日。早，王爷请张帅至尚书房谈话，闻张帅有辞职之说。已正，有飞艇一架自南苑飞来，抛下炸弹三枚，一在花园鱼池，一在储秀宫隆福门外，一在景运门内东南方，此弹炸伤二人，一侍卫承恩，一伊师傅轿夫。掷毕，飞艇向南飞去。……王爷令予至吴辟疆处，嘱其代为接洽，以停战为要。令陈师傅找王聘卿、梁师傅找梁嵩生说明，总以不再来飞艇为要。……

“讨逆军”空袭故宫，在皇室中引起震动，慌忙四处托人接洽停战，目的不过是“不再来飞艇

张勋此时计无所出，意欲辞职。复辟群丑的外强中干，于此可见一斑。绍英日记中类似的详细记述俯拾皆是，在此不能具引。这些资料，对于了解张勋复辟事件的发展过程，尤其是逊清皇室在事件中的作用，是颇为难得的史料。

参考文献:

郑天挺等主编：《中国历史大辞典》，上海：上海辞书出版社，2000年，第2032页。

熊治祁主编：《中国近现代名人图鉴》，长沙：湖南人民出版社，2002年，第52页。

绍英：《绍英日记》，北京：国家图书馆出版社，2009年，第1册第581—628页。